

赵山奎
著

精神分析 与西方现代传记

JINGSHEN FENXI
YU XIFANG XIANDAI ZHUANJ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山奎
著

精神分析 与西方现代传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神分析与西方现代传记/赵山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004-8055-6

I. 精… II. 赵… III. ①精神分析-研究②传记-研究-西方国家
IV. B84-065 K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8138 号

责任编辑 刘 兰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去岁山奎南游，移居金华，就是那座“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的文化名城。未及一年，山奎给我寄来了他的《精神分析与西方现代传记》，面对着即将付梓的这部书稿，我感到非常欣喜。

山奎所研究的是西方现代传记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精神分析学的奠基之作——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问世于1900年，这一年既是两个世纪的界线，也大体上可以看做西方学术的分野，正如人们常说的，它是一部改变历史的著作，也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西方学术变革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弗洛伊德的学生厄涅斯特·琼斯曾全面论析精神分析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巨大影响，其中包括临床医学、哲学、人类学、生物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学和艺术等十个方面；但是我们今天看来，琼斯当时还没有注意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传记。

西方现代传记的出现以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为代表。这部作品基本具备了现代传记的主要特征：不但叙述传主的生平、描述出他鲜明的个性，而且对传主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解释。“解释”是传记的要素之一，特别是现代传记的标志，不过鲍斯威尔解释约翰生的人格时，主要还是着眼于时代的特点和传主的经历，这种方法仍然是传统的。

使传记中的“解释”发生了根本改变而具有了当代特征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20世纪被称为“传记革命”的时代，这场“革命”的发生有着复杂的背景，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

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就是对人的解释。他通过解释梦，也解释了人的心理机制及其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进而解释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弗洛伊德也为自己的理论作出了示范，他的《达·芬奇》着重解释一位伟大人物的人格形成，尽管其中没有完整的传主生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对达·芬奇解释也未必能为人们普遍接受，但是它也预示了西方传记发展的新方向，深度的心理学解释从此成为西方传记的显著特点。

在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的影子在西方传记中或隐或显、随处可见，一些传记家向弗洛伊德学习，用俄狄浦斯情结、或是性理论和精神病理论来解释传主，更多的传记家则从弗洛伊德那里得到启发，用传主童年时代的经历来解释其一生。精神分析在改变着西方的传记观念，而诸如传记的真实性、传记的伦理规范以及传记家和传主之间的主体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也都因为精神分析学的介入而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从而大大推动了现代传记理论的发展。

山奎的这部著作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国内还没有人做过这项工作，在国外关于精神分析同传记关系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这样综合的、系统的研究似乎也未曾有过，其难度可以想见。山奎脚踏实地，他首先广泛收集资料，从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和传记观点入手，再以具有代表性的西方传记文本为对象，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考察精神分析各方面的影响，最后剖析传记理论对精神分析的接受以及所产生的分歧和争论。山奎把文本分析同理论探讨结合在一起，以出色的思辨和综合能力，对纷繁复杂的西方现代传记史作出明晰、简洁的梳理，对传记同精神分析的关系择其要点进行剖析，作出客观而中肯的评价。

本书的原稿是山奎在我指导下完成的一篇博士论文，这篇论文答辩的时候，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被评为南京大学文学院优秀博士论文。但是山奎并不满意这一成绩，这些年来他又不断收集资料，对文稿反复修改，扩充了研究的范围，也深化了自己的观点。他以七年的辛勤劳动，向中国传记界奉献了这一重要成果，这部著作必将推动我国传记研究的发展，无论对传记学者还是传记作家来说，它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祝贺山奎的成绩，我也相信他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浙江师大有研究传记的传统，在那里正可大展身手，努力吧！不过我也要提醒山奎：双溪春好、颇可泛舟，也别辜负了那美丽的风光胜景啊！

杨正润

2009年3月8日，秦淮河畔

目 录

序	杨正润(1)
导论	(1)
第一章 弗洛伊德的传记遗产	(14)
第一节 《达·芬奇》及相关论争	(14)
第二节 《达·芬奇》的传记史意义	(22)
第三节 弗洛伊德的其他传记性研究	(25)
第二章 弗洛伊德之后:实践与理论	(36)
第一节 精神分析传记的兴起	(36)
第二节 精神分析传记的发展与理论的新探索	(41)
第三节 跨领域合作与研究	(47)
第四节 精神分析与经典传记	(56)
第五节 从精神分析传记到心理传记	(62)
第三章 暧昧的童年	(68)
第一节 “俄狄浦斯情结”的启示	(69)
第二节 政治活动与童年场景	(74)
第三节 被“屏蔽”的童年记忆	(78)

第四章 “性”的迷雾	(86)
第一节 透视被压抑的激情	(87)
第二节 还原生活真实	(91)
第三节 探索非同寻常的性欲	(96)
第五章 疾病的隐喻	(104)
第一节 病理化:从病人到“病态身份”	(105)
第二节 疾病:身体的“语言”	(110)
第三节 疾病:个人与社会	(113)
第六章 愧疚的深渊	(125)
第一节 追踪“残酷的良知”	(127)
第二节 从“沉默”中理解罪感	(131)
第三节 抚慰“留连不去的创伤”	(134)
第七章 梦的解析	(142)
第一节 从“启示”到“分析”	(143)
第二节 普鲁斯特与“老鼠梦”	(146)
第三节 詹姆斯的“美妙的噩梦”	(149)
第八章 精神分析与传记的真实	(157)
第一节 “真实观”与解释的限度	(158)
第二节 “理论”与“事实”	(162)
第三节 精神分析视野中的传记证据	(168)
第九章 精神分析与传记中的移情	(173)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74)
第二节 精神分析的推进	(176)

第三节 “移情”与主体间性	(182)
第十章 精神分析与传记伦理	(187)
第一节 传记伦理的历史考察	(188)
第二节 当代传记伦理问题探讨	(191)
第三节 传记伦理的现代转向	(199)
结语	(204)
参考文献	(210)
附录：弗洛伊德与传记写作	[美]威廉·舒尔兹(226)
后记	(231)

导 论

精神分析与传记在 20 世纪的相遇与互渗无论是对精神分析还是对西方传记来说都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其影响至今绵延不绝。美国精神分析专业杂志《美国意象》(*American Imago*) 在 1997 年与 1998 年接连推出了两期和传记相关的专刊，^① 其中就谈到此前近一个世纪以来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双向利用和相互启发。戴维·胡德森认为，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关系在今日已经密不可分，精神分析与传记是“构建生命叙事的两种平行的方式。精神分析家在重构、记录其病人的个案史时常常会进行传记式的研究，而当代的传记家则往往必须解剖、分析传主的精神生活”^②。而阿德里安·哈里斯则从文体风格的相互影响这一角度指出：“许多文学类别，尤其是传记与自传，早已被精神分析技巧与观念浸透了；而我们如果在精神分析的病例写作中追溯一下文学惯例的话，其结果将把我们引入一个难以把捉的双重镜像之中。”^③

客观地说，这一影响虽是相互的，但并非对等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传记从精神分析那里所汲取来用以改变自身的因素，远比精神分析从传记那里所获取的东西更为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传记较之精神分析有一个更为长久的历史和传统，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历史和传统的参照，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和改变显得

① 这两期杂志所收入的论文来自 1996 年在美国纽约大学召开的“传记与精神分析”专题研讨会。

② David Hoddeson, “Introduction”, *American Imago* 54. 4, Winter 1997. pp. 324—325.

③ Adrienne Harris, “The Analyst as (Auto) biographer”. *Ibid.*, p. 255.

格外引人注目，而前者对后者的利用则被看做是很自然的事情；另一方面，许多著名的精神分析家（如弗洛伊德、琼斯、艾里克森等）都常常涉足传记领域，那些接受过精神分析治疗或者对精神分析有着独特兴趣的传记家（如玛丽·波纳巴、斯蒂芬·茨威格、利昂·艾德尔、乔治·派因特尔等）的创作自然也会打上精神分析方法的烙印。但反过来，传记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则不能胜任精神分析治疗和病例写作。鉴于此，本书主要考察这一“事件”的前一方面，即传记对精神分析的接受或者说精神分析对传记的影响。

一、现代传记与“心理学”

西方多数学者对现代传记主要特征的理解与他们对现代传记中心理学因素的强调有着许多共同的内涵，他们认为，现代传记之“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心理学因素在传记中的凸显，或者说，传记的“现代特征”与心理学的介入这二者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当詹姆斯·克利福德指出约翰生的经典作品《塞维奇传》所具有的“在传记艺术发展史上里程碑意义”就在于它“传达出了对于一个复杂个性的基本冲突所作出的真正理解”时，他所称赞的显然正是其心理学的洞察力。^①

对于“现代传记”，美国当代传记家简·斯特劳丝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她说：“现代传记在历史学与心理学、公共经验和私人生活之间的交汇点上找到了自己最好的位置。在过去，传记家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公众经验，而对于传主内心的、情感的动力因素则甚少注意。”^②而简要追溯一下西方学界关于传记的归属问题看法的基本脉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一看法。1683年，约翰·德莱顿在英语中第一次使用了“传记”（*biographia*）一词，将其界定为“特定的人的生平的历史”，它“更多地局限于行动、战争、谈判等其他所有公共事务”的领域。在他看来“传记”归属于“历史”这一更大的范畴，其地位低于历史的其他两种

^① James L. Clifford, *Young Sam Johnson*, McGraw-Hill Company, 1955. p. 276.

^② Jean Strouse, "Alice James: A Family Romance", in Runyan, W. M., ed., *Psychology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86.

形式：编年史（commentaries or annals）和历史（history）。^① 这种将传记写作的范围限定在传主“外部活动”领域的观点大体符合当时及此前传记创作的实际，但它反过来也制约着人们对传记本质属性的认识。及至 19 世纪晚期以及整个 20 世纪，几乎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传记作品文学属性的同时，^② 许多学者也开始强调心理学的洞察力对于传记写作的重要作用。如法国文学批评家圣勃夫就很重视作家的内心世界对作品的影响，把自己写作的以作家为传主的传记性作品称作“心理图像”（psychography）。^③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首次将以人的精神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称作诸精神学科，而传记在这诸精神学科构织而成的网络中得到了深入理解。狄尔泰非常重视传记，他尤其喜欢撰写思想家的传记，在他心目中，传记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心理学，“心理学是诸精神学科中第一和最基本的学科”，^④ 而“传记是人类学和心理学在问题中的应用。它使得生命同一性、它的发展及其命运变得栩栩如生和可以理解”^⑤。当代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不一定明显使用心理学的概念，但必定具有深刻的心理洞察力，有人甚至认为，由于传记在心理学方向上的发展，现代传记在整体上可以被称为心理学传记。^⑥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心理分析师、我国学者申荷永教授认为，西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心理学有三种单独的创立：冯特的“意识心理学”（以 1879 年在莱比锡建立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威廉·詹姆斯的“适应心理学”（以 1890 年出版《心理学原理》为标志）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学”（以 1893—1895 与布洛伊尔合著出版《癔症研究》为标志）。根据西方 20 世纪传记的实践情况，当我们说心理学对传记发生影响的时候，我们主要是指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学”即精神分析对传记的影响。弗洛伊德的《列

① John Dryden, From “The Life of Plutarch”, prefixed to *Plutarch’s Lives*, James L Clifford ed., *Biography as an Art: Selected Criticism 1560—19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7.

② 参看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 页。

③ 同上书，第 319 页。

④ [德] 威廉·狄尔泰：《体验与诗：莱辛·歌德·诺瓦利斯·荷尔德林》，胡其鼎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2 页。

⑤ 转引自谢地坤《走向精神科学之路：狄尔泰哲学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 页。

⑥ William Todd Schultz, 2004. See <http://www.psychobiography.com/definitions.html>.

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下称《达·芬奇》)发表于1910年,这标志着精神分析与传记真正意义的相遇,也标志着心理学对传记真正意义上的介入。

二、精神分析与传记的“现代化”

精神分析与传记的相遇这一事件的发生与西方现代传记的形成在时间上基本是同步的;而通过考察一个世纪以来围绕这一事件的种种讨论,通过考察20世纪西方传记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精神分析参与了西方传记的现代化进程。

正如“现代”这一概念本身一样,“现代传记”也首先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流动性的概念。但就迄今为止的传记史而言,一般认为,西方传记在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之后进入了“现代”,是为“现代第一阶段”。《约翰生传》以对传主生动活泼的人性化处理为特点,与此前的以道德说教为目的的刻板的圣徒传记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1918年英国传记家利顿·斯特拉奇发表了《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引发了波及欧美的“传记革命”,^①标志着西方传记进入了“现代第二阶段”。^②斯特拉奇部分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在鲍斯威尔的基础上深入一步,强调对于传主的深度解释,具有明显的精神分析旨趣。^③

此外,还存在对“现代传记”的另一种理解,即现代传记大致上就是指“20世纪传记”。我国学者杨正润在《传记文学史纲》中,就将20世纪传记作为一个整体划归为“现代传记”,美国当代传记家伊丽莎白·扬一布鲁埃尔也认为:“传

① 关于“传记革命”,参看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28页。

② 关于“现代第一阶段”、“现代第二阶段”的区分,主要参考了唐岫敏,《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博士论文,2004,南京大学档案馆藏,第1页)的相关提法。

③ 在《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的前言中斯特拉奇写道,聪明人写传记“会往至今还没有人发现的偏僻之处突然投去一道强光”,又会“随便沉下一只水桶,从极深海底钓上来一些独具特色的东西,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满怀好奇地仔细研究”。显然,这和精神分析对人物行为深度探索在旨趣上是一致的。参看《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前言》,逢珍译,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记作为一种现代文类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当然它有其伟大的先行者……但它基本上是一种 20 世纪的现象。”^① 将 20 世纪的传记看做“现代传记”还有一个特殊的理由，就是它的繁盛和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传记的数量、质量都有着极大地提高，对读者也有着更大的影响，在 20 世纪，传记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兴奋点，理解为何如此以及人们为何对它如此着迷是一件极其有趣的事情”^②。本书主要在这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现代传记”这一概念，而将以鲍斯威尔的作品为代表的从 18—19 世纪末的传记称为“近代传记”。

精神分析与传记的相遇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几乎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1910 年弗洛伊德《达·芬奇》的发表标志着精神分析介入传记的开始，此后的 20 世纪 20—30 年代，50—70 年代都出现了采用精神分析方法创作传记的热潮，出现了许多接受精神分析启发的传记家，产生了许多带有精神分析色彩的传记，其中不乏名家、名作。80 年代尤其 90 年代之后精神分析传记时有出现，大多有意避免早期此类作品常有的诸如模式化、哗众取宠及牵强附会等缺陷，在质量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值得一提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还将传记操作过程（biographical process）放置到精神分析视野之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跨学科研究，^③ 除了对传记中应用心理学方法尤其是精神分析方法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对精神分析与传记之间一般性关系进行考察外，还对传记操作过程中的主体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极大地深化了传记家对于传记活动的理解，强化了传记家对于掌握和应用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心理学重要性的认识。

到 20 世纪末本世纪初，精神分析与传记的相遇作为一个“事件”基本上已经结束了。2003 年美国《精神分析年刊》杂志出版了一期“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专刊，对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心理史学（其中主要是精神分析传记作品）的实践进行了探讨，尽管主编詹姆斯·威廉·安德森在《导言》中充满信心地写

① 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Th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1. p. 209.

② Ibid.

③ 具体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三节的相关内容。

道,在将“精神分析视野应用于传记写作”方面,“总会有新的方法出现,总会有新的改进和提高的空间”^①。但实际上,学者们并没有提出更切实可行的建议;此外,在传记实践中,作为一种传记类型的精神分析传记写作目前基本上已经被专业的心理学家所“归化”,在这种情况下传记常常被看做是进行心理学研究的“工具”,并不具有完整的传记特征;^②而在那些将精神分析作为“工具”的当代传记家那里,也往往有意淡化精神分析的“理论”色彩,更多地强调和其他心理学流派相融合,并有意引入诸如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进行多元解释。而有的作品则有意淡化和反对传记中的精神分析因素。^③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传记中那些十分典型的“精神分析”色彩的模糊和淡化并不意味着精神分析退出了传记的舞台,而或许正好意味着,精神分析那些有真正价值、经过了历史考验的因素已经悄无声息地消融到传记的传统中去了,和人类历史许多优秀的文化成果一样,成为包括传记在内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从而获得了更为恒久的生命。也可以说,精神分析在传记中的淡化也正说明它在传记现代化进程中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同时,站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我们也获得了一个对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关系进行回顾、考察、反思与总结的难得契机。

三、精神分析与传记的“现代性”

西方现代传记的主要特征或曰“现代性”与精神分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精神分析对西方传记的影响是整体性的,涉及传记写作与传记理论的几乎所有重

① James W. Anderson, “Introduction”, *The Annual of Psychoanalysis*, vol. 31, The Analytic Press, 2003. p. 3.

② 从威廉·T·舒尔兹主持的“心理传记”权威性网站 <http://www.psychobiography.com/biblio.html> 上提供的1999—2004年的“心理传记”研究的目录来看,主要是论文,传记专著很少,而论文则主要是心理学对于传记材料的“利用”。

③ 谢尔登·诺维克在1996年出版的一部亨利·詹姆斯的传记中就对艾德尔的经典作品《亨利·詹姆斯传》中的精神分析色彩表示不满,“艾德尔写的不是詹姆斯的生活,而是无意识以及机械般的俄狄浦斯冲突”,他认为,艾德尔对詹姆斯“同性恋”的弗洛伊德式的解释“现在看来已经非常老套了”。Sheldon M. Novick, *Henry James: The Young Mas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p. xiii.

要问题。杨正润概括了西方传记从古代、近代到现代所发生的重要转向：“如果说从约翰生和鲍斯威尔开始的近代传记追求外部行为的真实，那么现代传记则把表现心理真实看做更重要任务，这样也就从传主生平的叙述进入对传主行为的解释。”^① 追求深度真实（包括心理真实）、进行深度解释作为现代传记的首要特征，与精神分析探求人的深层心理、寻找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有着一拍即合的默契；作为一门新兴的精神科学与一套行之有效的解释体系，精神分析进入传记写作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它适应了现代传记的要求，带来、促进并强化了“深度解释”这一现代传记的主要特征。

现代传记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高度的敏感性（heightened sensitivity）。这一敏感包括传记家对传记材料的更为精细的处理、传记家对自己与传主之间密切而复杂关系的更为深入的理解和现代传记更为隐蔽的伦理追求，等等。美国传记家理查德·埃尔曼指出，如果我们试图总结现代传记的特征的话，“首先就是其高度的敏感性”，传记家“不再将自己看做外在于传主的旁观者，而是内在于他/她的探索者”；他进而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特征可以归功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教导我们要“把一切经验都看成症状，日常生活的琐事能够和生命中的重大危机一样提供启示”，^② 正是由于弗洛伊德，“人格中的种种复杂性引起了我们的注意”，^③ 也正是由于弗洛伊德，“一个现代传记作者不得不关注非理性对理性领域的入侵，去探索意想不到的关联和未曾受到怀疑的动机”。^④

此外，与古代、近代传记相比，现代传记还拓展了许多新的表现领域，带来了新的关注中心，如传主的童年经验、性经验、人性病态、愧疚感和梦，等等。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方面在古代、近代传记作品中大多没能处理或很少加以处理。显而易见，正是精神分析论证了上述这些方面的重要性，揭示了其深层意义，为传记家带来了理解传主的新视野。但另一方面，这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传记

① 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5页。

② 参看 Richard Ellmann, “Freud and Literary Biography”, *American Scholar*, Autumn 84, vol. 53 Issue 4, p. 472.

③ Ibid., p. 477.

④ Ibid., p. 478.

的真实性问题与现代传记伦理问题的新的思考和争论。

四、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精神分析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在 20—40 年代，张东荪、张竞生、高觉敷、朱光潜、章士钊、汪敬熙及潘光旦等人都积极译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其中高觉敷的译介工作持续到 80 年代），一时成为热潮，精神分析学说对包括鲁迅、郁达夫、郭沫若、施蛰存、张爱玲、曹禺等在内的许多现代作家都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1949 年到 70 年代末，精神分析在中国的传播处于停滞状态，但 80 年代中期出现了“弗洛伊德热”，大量弗洛伊德的著作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爆炸式地进驻国内学界，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释梦》（有的译作《梦的解析》或《梦的释义》），等等。此外，荣格的《探索心理奥秘的人》、《心理学与文学》等，美国弗洛姆、卡伦·霍尔耐为代表的新精神分析理论，法国拉康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以及瑞士方迪为代表的微精神分析理论等也都被介绍进来。除去大量不同版本的零散译本，到 2004 年，出版了一批丛书和文集来较大规模地译介精神分析，具体有：安徽文艺出版社的“精神分析学译评丛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精神分析经典译丛”、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当代经典精神分析译丛”、长春出版社的 8 卷本《弗洛伊德文集》以及上海三联书店的《拉康文集》等。^①

对于精神分析在小说、诗歌、戏剧等领域及文学批评方面的影响，国内学界已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传记研究本身的薄弱和落后，对于精神分析对传记写作以及传记理论的影响，我国学者直到 80 年代才只有零

^① 但作为治疗的精神分析在我国还非常落后，国内迄今没有一个专门的学会（“国际促进中国精神分析学会”2003 年在美国注册），也没有一份专业杂志，精神分析专业人员十分稀缺，获得国际承认的精神分析师几乎是空白；即使是较低层次的分析性心理治疗师也严重不足。但这种情况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得以改变。2004 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精神分析年会上已经提出创办精神分析专业刊物，建立中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建议，华南师范大学已经建立了心理分析（荣格学派）博士点，四川大学也设有精神分析专业的硕士点。